
“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进步报刊

朱敏彦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军占领区的“孤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这四年零一个月,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上海新闻界、文化界的爱国志士创办了一批抗日进步报刊,教育“孤岛”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利用租界当局英、美、法等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借外国人的名义,办中国人的报纸,这是“孤岛”时期的抗日报刊普遍采用的迂回战术

上海成为“孤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团体和进步新闻文化工作者主办的报刊《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救亡周刊》、《文化战线》旬刊、《战线五日刊》、《战时教育》等都不得不宣告停刊,有的只能迁往外地出版,“孤岛”上一时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战斗在“孤岛”上的爱国的新闻文化工作者,坚持与敌人进行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中共领导的救亡团体率先办起了《团结周刊》(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联合刊物,由刘少文、王任叔、梅益等负责,潘蕙田具体编辑)和《学生生活》半月刊(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主办)等刊物,打破了“孤岛”一时沉寂的局面,传播着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然而这些刊物都是通过各救亡团体发行网传递,发行量小,远远不能满足沦陷区人民关注抗战时局的渴求。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所形成的一个号称“中立”的十分微妙的政治环境,利用日寇对外商办的报刊不

予检查的特殊条件,借外商的名义,在租界上办起了一批抗日报刊,绕开日军的检查,进行抗日宣传。

利用外国报刊在租界的合法性,创办纯翻译报纸,是战斗在“孤岛”上的新闻工作者最先采用的斗争方法。当时上海租界出版的外国报刊种类繁多,有英文的《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法文的《上海日报》,俄文的《柴拉尔报》、《俄文日报》,德文的《远东新闻》等。另外,还能看到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法国的《人道报》,美国的《新群众》杂志,英国的《曼彻斯特导报》等。这些外国报刊登载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些外国报刊在租界的合法性,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了一份独特的纯翻译报纸《译报》,一切新闻特写、通讯、评论都译自外国报刊。该报是上海党组织文委主办的一份公开报纸,由夏衍、梅益等负责。选译的文章有的介绍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情况,如创刊号上首条特稿为《毛泽东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有的报道了根据地人民欣欣向荣的生活情景,如美国记者写的《中国西北的新社会》;有的报道了苏联、法国、美国等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译报》的出版,就“象黑夜天空里的一颗星星,在浓黑里射出一股悦目的光芒,稍能提供一点真实的别人不能登载的消息,和几篇使人兴奋清醒的文章”,“给予读者以抗战的理论教育的翔实的参考资料”。^①但是,这张深受读者欢迎的《译报》刚刚出版了几天,便遭到日寇和汉奸的骚扰,最后只得于12月20日出版了第十二期后被迫停刊。

挂上洋商的招牌,办中国人自己的报刊,既能稳妥地减少来自租界当局的阻力,更能有效地避免日寇的“新闻检查”,这是继《译报》停刊后,战斗在“孤岛”上的抗日报刊普遍采用的创造性的迂回战术。进步的新闻工作者请了两个与公共租界有特殊关系的英商大学图书公司的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出面担任发行人,挂

^① 张静庐:《中国现代报刊史料》丁编上卷,中华书局1956年3月版,第322页。

上了英商牌子,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并有了一个英文刊名《The News Digest》,于1938年1月28日重新出版。实际上两名英商只是挂名而已,不能干涉报社内部事务,因此,该报仍是上海党组织文委领导下的报纸。编辑部由文化界救亡协会党团的梅益、王任叔、杨帆等负责,营业部由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的王纪华、许德民、石志昂等负责。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该报改版。改版后的《每日译报》就不再是初办时的纯翻译的报纸,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倾向更为鲜明。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阵地,《每日译报》编辑部还于1938年10月10日增办了《译报周刊》。该刊虽然单独向公共租界登记注册,仍由英商孙特司·裴士担任发行人,但工作人员多数由《每日译报》的人员兼任。这样,既增大容量,又灵活多样,一报一刊,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共同进行抗日宣传。继《每日译报》创办后,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又创办了《导报》和《导报增刊》(由梅益、杨潮、林淡秋等负责)、《职业生活》周刊(职工刊物,由张承宗、石志昂、陆志仁等负责)、《上海妇女》半月刊(妇女刊物,由许广平等负责)、《公论丛书》(由王任叔主编)、《文献丛刊》(由钱杏邨主编)等报刊。

在《每日译报》的影响下,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陆续出版了抗日报刊。严宝礼等几个铁路职员共同集资,找了曾经担任过英文《文汇报》(The Mercury)记者的英国人克明担任发行人,于1938年1月25日创办了《文汇报》(英文报名为《The Standard》)。该刊主笔是徐铸成,负责编辑部的全盘工作,国际新闻编辑储玉坤,副刊编辑柯灵,记者邵伯南等,都是新闻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该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曾在“孤岛”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它进步报刊如《华美周刊》、《大英夜报》、《大美晚报》、《大美晨报》、《循环报》等也都挂上外商招牌先后问世。《申报》也于1938年10月10日重新迁向上海,由美国人阿乐满任董事长,挂起美商哥伦比亚公司的招牌复刊;《新闻报》也挂起美商招牌,免受日军检查的耻辱。《洋报辩》一文中说挂洋牌子办报,其目的是为了在“侵

略者的压迫下,曲曲折折地向读者传达心声”。^①

此外,进步的文艺刊物《鲁迅风》、《文艺》、《文艺新潮》、《文艺集材》、《野火》、《行列》、《戏剧与文学》、《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学丛刊》、《译文丛刊》等也纷纷创办。^②一段时期,上海“孤岛”上的抗日进步报刊林立,形成了一个新闻文化领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宣传阵地日益得到扩大。

为了在“孤岛”上站稳脚跟,这些抗日进步报刊大多在创刊号上登载了标榜“言论自由”,“大公无私”的发刊词。如《每日译报》发刊词声明,该报“对于所提供的题材,毫无特殊的偏见,更无偏重的成见”,而是“尽量地要大公无私地来选择”,使该报能够成为一份“对于别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事,发生好奇的心理。一般说来,这就是《每日译报》的主要的宗旨”。^③《文汇报》也表明该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④这无疑等于穿上了一件染上“中性”色彩的外衣,掩护了宣传抗日的真实意图,减少日伪新闻检查机关的注意,从而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斗争。

二 敢于在敌占区报道抗日消息,宣传抗日救国, 表达沦陷区人民心声,这是“孤岛”时期的 抗日报刊遵循的根本方针

《每日译报》、《文汇报》等创办以后,深受“孤岛”各阶层群众的欢迎。《每日译报》重新出版后,不到半年,连续三次扩版,从四开一张小报变成对开一张半大报,而且还增办了《译报周刊》,仅《译报周刊》的发行就达2万份。《文汇报》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不到

① 《文汇报》,1938年7月18日。

②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卷,第312页。

③ 《每日译报》,1938年1月28日。

④ 《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

半年也连续两次扩版,日出对开三大张,发行量迅速超过了5万份。这些报刊之所以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申张民族大义,宣传抗日救国”^①的编辑方针,敢于在敌占区报道抗日的消息,发表抗日言论,表达了沦陷区人民的心声。

《文汇报》创刊号头条新闻就以《津浦线发生激烈战斗,我国军队两路包围济宁日军》为标题,报道了津浦线上中国军队猛烈地发动对日军进攻的战况。^②1938年1月28日,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六周年纪念日,《文汇报》发表了该报创办后的第一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缅怀了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十九路军广大官兵“英勇抗战,可歌可泣”,令人对中华民族“肃然起敬”的事迹,希望广大军民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英勇抗战,“坚持到底,最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③

华北沦陷以后,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创刊不久的《文汇报》即连载了李英声写的《中国红军十年史》,赞颂“八路军在品质上,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军队,在士兵成分上,也是最纯粹最精髓的军队,它不是雇佣军,可以说是纯粹的革命志愿军”。^④这是在“孤岛”上首次载文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38年5月和6月,《每日译报》先后两次登载了介绍八路军的专文《中国的八路军》和《中国八路军国民革命军》,赞颂这支“由从前的中国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国民革命军……从平型关的光荣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从那时起,八路军就没有停止过战斗,在前线上和敌人的后方活动着,打击着和袭击着日本军队”,从而造成对“华北日军的大威胁”。^⑤此外,《每日译报》和《译报周刊》还先后登载

① 徐铸成:《文汇报初期的编辑部》,载《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89页。

② 《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

③ 《文汇报》,1938年1月28日。

④ 《文汇报》,1938年2月2日—5日。

⑤ 《每日译报》,1938年5月5日。

过斯诺写的《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张香山写的《随军日记片断》等文章,对八路军的战功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八路军跟日军打了七八个月之后,已成为全中国最强大的一路军队”,在华北“所谓‘被占领’的区域,有一半仍在八路军的控制下,它在里边生活、工作,而且显然在繁荣滋长”。^①

对活跃在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的活动情况,这些报刊更是作了充分的介绍。1938年夏,新四军向南京、芜湖方向挺进,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每日译报》随即以《新四军战绩纪实》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情况:“活跃中的江南游击队,自经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的新编第四军开到北来,声势更见浩大。现日军越发惊惶万状,南京近郊,草木皆兵。”^②特别是在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译报周刊》为此专门出了《新四军特辑》,刊登了反映新四军战斗、学习、生活各方面的照片25幅,登载了布鲁斯先生写的《新四军印象记》、《新四军教导营和服务团》等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四军的组成和战斗情况。^③ 孤岛人民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正活跃在江南敌后,开展了支援新四军的活动。抗战初期,《每日译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毛泽东《论持久战》,使孤岛人民在万分苦闷中拨开迷雾,认清了抗战的前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报刊还先后登载了毛泽东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周恩来的《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和《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的新政策》等演讲,以及延安《新中华报》的《对国民参政会闭幕式之评论》等文章,大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

在这些抗日报刊中,钱杏邨(阿英)主编的《文献丛刊》(该刊1938年10月10日创刊,每月一卷,至1939年5月10日共发行了

① 《每日译报》,1938年6月3日。

② 《每日译报》,1938年8月25日。

③ 《译报周刊》,第1卷第5期,1938年11月9日。

八卷)是一份以登载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该刊登载了会议的电文、决议等全文,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全文,介绍了整个会议的情况。该刊还刊登过周恩来《论继续抗战必获胜利》,朱德《论第三期抗战与华北》、《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彭德怀《谈两党合作》、《必须坚持华北抗战》,叶剑英的《论晋察冀边区初步胜利》、《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等重要文章和讲话。通过这些抗日报刊,孤岛人民了解到共产党抗日主张。

相持阶段到来后,孤岛上的抗日进步报刊抨击妥协投降论调,奋起讨伐汪逆卖国罪行。1938年10月19日的《译报周刊》就严正指出,接受“和平运动”的结果只能是“解除抗战军事武装”,“取消抗战的民族精神”,“向着亡国灭种的道路奔驰”。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打破敌人的“和平运动”,“朝野一致立即堵塞调停之门”,才能使“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有把握”。^①另外,《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还大量选登有关慕尼黑会议的文章和资料,如《张伯伦的戏法》、《英法出卖捷克》、《张伯伦的放火政策》、《捷克悲剧》等,提醒国民党当局,避免出现远东慕尼黑的局面。

汪精卫集团叛国后,这些抗日报刊又发表了《今之秦桧,举世公诛,汪精卫惟恐中国不亡,与平沼(日本首相)订立卖国协定》、《时代的淘汰》、《汪自走死路》、《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汉奸论》、《一片讨汪声》、《彻底肃清动摇分子》等社论、评论和文章,谴责汪逆的叛国行为是自绝于人类,“秦桧、吴三桂及至王克敏、梁鸿志辈,显然还不能比拟他”,每一个中国人必誓死反对。这些报刊力主通缉汪精卫及其党羽,治以叛国通敌罪,并消除隐伏在各地与汪逆互相呼应的分子,肃清汉奸卖国理论。^②

① 《译报周刊》第1卷第2期,1938年10月19日。

② 《译报周刊》第2卷第2期,1939年4月20日。

三 灵活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与敌周旋,始终坚持着不屈的韧性的斗争,这是战斗在孤岛上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的可贵品格

《每日译报》、《译报周刊》、《文汇报》等抗日进步报刊坚持“申张民族大义,宣传抗日救国”的编辑方针,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军事形势,有力地鼓舞了“孤岛”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但是,却招致了日寇、汉奸的切齿痛恨。他们对在租界内以外商名义办的抗日进步报刊,采取恐吓、枪击、暗杀、捣毁等手段进行破坏。《文汇报》创刊后没几天,经理部就被受日本特务和汉奸指使的暴徒掷进一枚炸弹,炸死炸伤多人。以后,编辑部又接连两次收到一段血淋淋的手臂和注射过毒药的水果。《每日译报》出版后,日伪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捣乱,起初写信恐吓,继而指使暴徒用手榴弹袭击了《每日译报》和《导报》。但是真正的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是不怕死的,日伪的破坏只能使他们感到更加愤慨。《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接到恐吓信后,立即在该报副刊《夜光》上发文表示:“余之头颅能得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之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这充分表现了孤岛上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宁死不屈的精神。不幸,朱惺公终遭日伪指使的暴徒暗杀。但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则更勇敢、更坚定地坚持着对敌斗争。

1939年夏,孤岛上形势日趋严重,日伪加紧了对抗日进步报刊的破坏。一方面,他们利用英美等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弱点,进一步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取缔租界内的抗日活动和抗日言论。1939年5月18日,租界当局以“《文汇报》、《译报》等英商华文报纸,因刊登重庆来电蒋委员长生产建设会议演词,未符业经通知手续”为借口,迫令这两家报纸“即日起暂停两星期”。^①另一方面,他

^① 《申报》,1939年5月19日。

们又采取釜底抽薪的毒计，卑鄙地用巨额金钱收买了《文汇报》英籍发行人克明和《每日译报》英籍发行人斐士和鲍纳，诱使他们不再出面发行，致使这两家报纸停刊两星期届满后始终未能复刊。

《每日译报》停刊后，《译报周刊》的处境更为困难，该刊抓住能再出一期的机会，作了最后一次的斗争，花了很大的力量，于6月22日出了一份量很重的《译报周刊》第2卷第10、11期合刊（特大号），以显著的地位，登载了叶剑英的《日军跳跃作战和中国的应付》文章，编辑了《中国抗战两周年纪念》和《抗战两年来的上海》两个特辑，深刻分析了两年来对敌斗争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帮助读者提高认识。该期表示沉痛地告别读者。^①其它抗日进步报刊如《导报》、《导报增刊》、《大英夜报》、《文献丛刊》、《职业生活》等也都不得不在此期间先后向读者告别。这样，孤岛上的新闻文化斗争进入了更困难的时期。

《每日译报》等抗日进步报刊停办之后，一部分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只得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等地开辟新的战斗阵地，这时“孤岛”新闻文化界又沉闷起来。但是，留在上海的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正如《译报周刊》在《告别读者》中指出的那样，尽管抗日进步报刊遭到严重挫折，但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蓬勃起来的，这同中国抗战一样，必然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自然要更坚决地更沉痛地战斗下去，‘碗里不见镬里见’，后会有期”。^②

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资产阶级报纸，甚至国民党主办的报纸撰写社论，编辑副刊，发表进步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是“孤岛”后期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经常采用的斗争方式。如王任叔、梅益、杨潮等除了为《每日译报》、《导报》撰写社论外，还曾分送社论给《大英夜报》、《华美晨报》、《华美晚报》等报发表，甚至把收到

① 《译报周刊》第2卷第10、11期合刊，1939年6月22日。

② 《译报周刊》第2卷第10、11期合刊，1939年6月22日。

延安《解放》周刊和重庆《新华日报》上的许多重要文章在《华美周刊》上登载；王任叔也曾一度为《申报》编辑副刊《自由谈》等。到了1939年夏天以后，这一斗争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起来。中共领导下的新闻文化工作者如王任叔、梅益、林淡秋、孙冶方、柯灵等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凭借他们在新闻、文化界的影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神州日报》等报纸撰写社论、评论，为《大美报》编辑副刊《浅草》，《浅草》停刊后，又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等。尽管言论受到较多限制，但毕竟还是给沉闷的“孤岛”吹进了一些清醒的空气，使生活在孤岛上的群众看到一些立场正确和健康的文章。

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地办起各利刊物，公开和秘密结合，期刊与丛书相呼应，这是“孤岛”后期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采取的又一重要斗争方式。这段时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办起了《学习半月刊》（理论学习刊物，由王任叔负责，韩述之为主编）、《上海周报》（综合性刊物，由张承宗总负责，吴景崧为总编辑）、《海沫半月刊》（学生刊物，王涵钟、钟恕主编）、《简报》（工人刊物，纪康、张承宗等负责）、《大陆月刊》（文化综合刊物，王任叔、楼适夷等负责）等刊物。这些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人，但其公开发行人却由中间人士，甚至外国人担任。如《上海周报》请了英国人佛利特出面担任发行人，并用英文刊名《Shanghai Guardian》出版；《学习半月刊》利用女学生郁静（刘也萍）是天主教徒的身份，向租界当局提出申请后获得出版登记证。《大陆月刊》的公开主持人裘柱常（裘重）是美国教会学校的普通教员。这些刊物在编排稿件时，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文章，一般用笔名发表。如《大陆月刊》，由于刊物中署名作者有许多是鸳鸯蝴蝶派人物，被当时的一些人误认作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这些刊物一般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人员都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进行韧性的斗争。与此同时，进步的新闻文化工作者还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刊物。当时出版期刊仍须向租界当局申请登记，而出版丛书，则可免受此项限制，只要按时出版，

丛书与期刊无异。在此之前,《每日译报》编辑部曾办过《公论丛书》,一月一期,并针对当时短兵相接的政治形势,改原来的月刊为旬刊,出版了《求知文丛》,以便能更快更及时地传达中共的方针、政策,介绍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该刊由江闻道(圣逵)任主编,每旬一期,每辑的书名取自该辑中的一篇文章题目,主编还就该辑的主要内容,写“本期介绍”。该刊共出了31辑,主要有《德国的内幕》、《太平洋新形势》、《日苏关系论》、《中国往哪里去》、《上海的前途》、《存亡的关键》、《论国际形势》、《论苏德战争》、《论远东时局》、《国际形势与远东危机》和《民主与专政》等。丛书和期刊相结合,更灵活、更多样地进行斗争,宣传抗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完全被日军占领,上海孤岛状态也不再存在,上海的抗日进步报刊纷纷被迫停刊。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上海中共组织领导和影响下的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只能以曲折、分散、秘密的方式出版刊物,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